

庄子的批判精神

——《天下》篇新探

王仲鏞

《天下》篇是《庄子》中最末的一篇，列在“杂篇”。前人对它，向来十分重视。如王闿运《庄子注》，刊落“外、杂诸篇”，独存此篇，以为“盖庄子自叙”，“通于道原，非圣人不能言此。”（《庄子注》本篇序言）近人马叙伦先生也说：

《庄子》虽然有三十三篇，仅仅只有“内七篇”确实是庄子写的，“外篇”就不敢随便下断语了；至于“杂篇”，除《天下》篇外，前人都说不是庄子自己的作品，我完全同意这个论断。至于《天下》篇，我认为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学术的结论，可能也是庄子写的。我们如果说不是庄子写的，很难找出另外一个人有这样精通一个时代的学术，更有这样的大手笔。如果作为庄子写的自序，那是天衣无缝了。（《庄子天下篇述义序》）

在今天，尽管对于《庄子》一书中的内七篇，或者外、杂诸篇的作者与时代问题，学术界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，但于《庄子》这部书，主要是庄子及其后学的著述总集，是庄周学派的一家之言，则应无多异议。而《天下》篇不仅论述了当时的学术流别和自己的立言宗旨，更体现了庄周学派的批判精神。这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。

在《天下》篇里，庄子一共提到了六个学派，对待他们，则分别采取的是三种不同的态度。

对于“墨翟、禽滑厘，宋钐、尹文，彭

蒙、田骈、慎到三派，他既有肯定，又有批判。

在行为哲学上，道家与墨家本来是正相反对的：一个主张清静无为，一个却要“栝风沐雨”，“日夜不休”。可是，在《天下》篇里，庄子对于墨翟、禽滑厘一派，却肯定他们“不侈于后世，不靡于万物，不暋于数度”的崇俭思想，及其“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”的积极救世精神。（《天下》篇，以下凡引自本篇的，不另注明）他认为墨翟一派的最大问题是“过”：“为之大过”，“使后世之墨者，多以裘葛为衣，以跣跣为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。”做得太过了分；“己之大顺”（章炳麟云：顺借为踳，舛之或字，即乖违的意思），非礼薄葬，“其道大觳”，违反了人之常情，也是太过了分。所以说：“其意则是，其行则非。”动机虽好，效果却适得其反。

本来，“俭”是道家的“三宝”之一，老子就说过：“我有三宝，持而宝之，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”（《老子》六十七章）对于庄子肯定墨翟一派的崇俭思想，很好理解。至于对他们的积极救世精神，庄子也热情赞扬，就有些令人觉得费解了。这主要由于这些年来，庄子被认为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者，其思想意识，是彻底的悲观绝望；而不承认他是“百家”中的一家，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，其奋笔著

书，参加争鸣，必有所为。就以非战思想而论，在那“争地一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一战，杀人盈城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的时代，他虽然不会象墨翟那样去奔走呼号，言其不利，可却讲了“蛮触相争”（《则阳》）的寓言故事，说明战争的毫无意义，以否定战争来消弭战争。

其对于宋钘、尹文一派的“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”，“救民之斗，禁攻寝兵，救世之战”，也同样予以热情赞扬：“图傲乎救世之士哉！”（郭象注：图傲，挥斥高大之貌）另一方面，他批评各家，往往着眼于“天下人”。如说墨家：“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”；说宋钘“上下见厌而强见”，“天下不取”；说彭蒙、田骈“常反人，不见观”；说惠施“能胜人之口，不能服人之心”，这些都可以证明：庄子也并非“无意于人世”的。他面对当时那种“殊死者相枕”、“桁杨者相推”、“刑戮者相望”（《在宥》）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实，内心里的确是充满了悲天悯人之情，但他决不是“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”。从《天下》篇的论述中，我们便可得出完全与之相反的结论。

对于宋钘、尹文一派，庄子还肯定了他们“不为苛察，不以身假物”的克己容众思想。对于这一派，庄子认为他们的问题主要是“浅”，譬如他们定乎内外之分（“以禁攻寝兵为外，以情欲寡浅为内”），辨乎荣辱之境（“见侮不辱”，郭象注：“荣己而辱人”）（《逍遥游》）；能够做到“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”（同上），的确是难能可贵。但是，对于“至理内足，无时不适；忘怀应物，何往不通（释湛然《止观辅行传》弘决引王眷夜释“消摇”义）的高深境界来说，所谓“内（我）外（物）”，“荣辱”，就不值得斤斤计较了。故曰：“其大小精粗，其行适至是而止”，“斯已矣！”（《逍遥游》），认为他们是“道”止于此，再也上不去。

对于彭蒙、田骈、慎到一派的思想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：庄子是吸取较多。然而，他却断然地说：“彭蒙、田骈、慎到不知道”。同时又说：“虽然，概乎皆尝有闻者也。”看来，这倒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

从《庄子》中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他有许多和慎到一派相似的思想，甚至于还使用了他们的语言。例如：慎到讲“弃知”（音智），庄子则讲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；已而为知者，殆而已矣”（《养生主》）。主张“不以有涯随无涯”，则近于“弃知”。又如，慎到讲“去己”，庄子则言：“至人无己”（《逍遥游》）。慎到讲“缘于不得已”，庄子便说：“古之真人，其状……崔嵬乎其不得已乎！”（《大宗师》，《释文》：“向云，崔崔，动貌。”）

“托不得已以养中，至矣！”（《人间世》）还说：“动以不得已之谓德”。“有为也欲当，则缘于不得已。不得已之类，圣人之道。”

（《庚桑楚》）此外，慎到主张“齐万物以为首”，庄子就著了《齐物论》，这就难怪乎有的研究工作者，已经认为《齐物论》是慎到所作的了。

怎样解释这种复杂的现象呢？我们准备借用荀子对慎到的评论来试作探讨：荀子说：“慎子有见于后，无见于先”（《天论》）。这是针对他过分强调“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”，以至于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言的。庄子也和慎到一样，强调客观必然性，因而，也有极相近似的主张。所不同的，是他之所以讲“无己”，乃是要做到“至理内充”，把主体的“己”与客观的“道”相融合；他之所以讲“不以有涯随无涯”，乃是要立足于“以道观之（物）”（《秋水》）的高度，让自己的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相一致；他之所以讲“缘于不得已”，乃是要做到“忘怀应物”，防止主观主义，真正按照客观规律办事。这与慎到的“于物无择，与之俱往”，“推而后行，曳而后往。若飘风

之还，若羽之旋，若磨石之隧”，“椎柏斲断（圆滑无锋稜之貌），与物宛转”，完全陷于被动状态之中，是根本不同的。由于其近似于“道”，所以庄子说他“概乎有闻”，似是而非，所以又断然说他“不知道”。

荀子还说：“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”（《解蔽》）；“尚法而无法，下修（轻视贤智）而好作（制立刑名）”（《非十二子》）。这是他过分强调“弃知”的必然结果。因为“弃知”，他采取了一种“舍是与非，苟可以免”的圆滑态度，“上则取听于上，下则取从于俗”（《非十二子》），自己则毫无主见。所以，尽管他们“终日言成文典，反训察之（反复加以考察研究），偶然无所归宿，不足以经国定分。”（同上）这正是由于他们“无用贤圣”，不承认“小知不及大知”（《逍遥游》）这一客观事实的结果。他们认为“知不知”，有智就是不智。“将薄知而复（原作后，据孙诒让说改）邻伤之也。”把智慧的作用贬损到零。既“弃知”，又加之以“不教”，否定了教育的作用，把“至于若无知之物”作为行为的最高准则。这与庄子的明道则尊乎至人，立言则重乎耆艾，真可谓大相逖庭了。庄子很重视“教”与“学”，书中不仅记载了许多师弟讲说的寓言故事，还论述了自己所提倡的一套“心斋”、“坐忘”之类的学道方法。在他看来，只要肯不断地下功夫（所谓“积”），一个人是可以从“小知”至于“大知”，从“有待”至于“无待”，从“众人”至于“圣人”的。总的说来，他的最终目的，是通过学道，去达到一种叫做“撝宁”的境界（见《太宗师》），到了这种境界，自己就能与“道”同体同德——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一”（《齐物论》）；就能“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”（《逍遥游》），“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”，无待而常通。这与“慎到之道，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”，自然更是大异其趣了。

《齐物论》问题，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。

对于关尹、老聃一派，《天下》篇主要是述其大旨而加以赞扬。庄周一派，则论其指归，并及其立言之体，处世之方。采取的都是一种正面称述的态度。兹可不论。

对于惠施、公孙龙一派，他的态度又自不同了，主要是批判。

惠施与庄子同为宋人，他们在一生中，既是朋友，又是论敌。惠施死了，庄子讲了一个十分脍炙人口的故事：

庄子送葬，过惠子之墓。顾谓从者曰：“郢人堇慢其鼻端，若蝇翼，使匠石斫之。匠石运斤成风，听而斫之，尽堇而鼻不伤，郢人立不失容。宋元君闻之，召匠石，曰：‘尝试为寡人为之。’匠石曰：‘臣则尝能斫之，虽然，臣之质死久矣。’自夫子之死也，吾无以为质矣，吾无与言之矣。”（《徐无鬼》）

匠石的绝技，只有在郢人的鼻端才能施展。

“郢人逝矣，谁与尽言”（嵇康：《送秀才入军》），深切的知己之痛，历来感动了很多。可是在另一些寓言故事中，则每每提到惠施，不是一场辩论，就是互相讥评，庄子对他，真是毫不手软。而惠施身为梁相，却能以平等态度对待庄周。有个故事说，惠施害怕庄周到梁国夺取他的相位，“搜于国中三日三夜”（《秋水》），那恐怕是故意编造出来讽刺他的。庄子本来就厌恶权贵。当时传说的“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，庄子见之，弃其余鱼”（见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）的故事。表现的也是同样的厌恶感情。但这些，却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。

被汉人称为“名家”的惠施、公孙龙一派，在当时是一门新兴起来的学问。鲁胜《墨辩注序》说：“墨子著书，作《辩经》以立本，惠施、公孙龙祖述其学。”恐怕未必可信。在庄子的时代，墨子的一部份后学的确也归入了这个行列，这就是《天下》篇中所说的“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苦获、己齿、邓陵子之属，俱诵《墨经》，而倍谲不同，相谓‘别墨’，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，以觭偶不侔之辞相应”的那些人。在

《庄子》那些寓言故事中，惠施总是辩论输理，受到批评的一方，如“大瓠”、“大树”有用与无用之谈（《逍遥游》），“人而有情”与“无情”之论（《德充符》），“天下皆羿、天下皆尧”之说（《徐无鬼》），鼓盆之歌（《至乐》），濠梁之辩（《秋水》），莫不如此。庄子后学，还以井蛙之陋，揆击了公孙龙（《秋水》）。这是因为，在庄周一派看来，“知诈渐毒，颀滑坚白，解垢同异之变多，则俗惑于辩矣。”（《胠篋》）认为他们无益于治道而可以乱天下。从《庄子》中，能够见到他在理论上批判这一派的地方不多。《齐物论》里，“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；以马喻马之非马，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。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”云云，涉及到公孙龙“物莫非指，而指非指”（《公孙龙子·指物论》）和“白马非马”（同书《白马论》）这些命题，但没有充分展开过讨论。

庄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惠施、公孙龙的学说：“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”，“能胜人之口，不能服人之心”，它违反了人们的常识。从今天看来，他们这一派，在分析名实的问题上，接触到了个性与共性、名言与对象、静止与运动、有限与无限等一系列矛盾，对于古代逻辑思维的发展，有一定的推动作用。但他们不是辩证地看问题，而是以形而上学的方法，把这些矛盾关系，或者片面夸大，或者加以割裂，其结果，只能成为一种诡辩。正象庄子所指出的：“适得怪焉”。

庄子批评惠施：“今子外乎子之形，劳乎子之精，倚树而吟，据槁梧而瞑，天选子之形，子以坚白鸣”（《德充符》），可算击中了他的要害。他身为梁相，却不认真处理政事，正有点象西晋时代“使神州陆沈、百年丘墟”的王夷甫那样的清谈家（见《世说新语》），

又：《北齐书·杜弼传》言：弼“又注庄子《惠施篇》”。有的人就说《天下》篇“惠施多方”以下即《惠施篇》之文。其实，就全篇来看，“惠施多方”以下一段，乃是

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，杜弼“耽好玄理”，或特留意于“名家”之言，于是裁篇别出，详为作注。因为在这一部分当中，列举了惠施十事和辩者二十一事，乃是专门之学，难于索解，而郭象只有最后一条总评式的注文，余均无注。杜弼因而补其所阙，这是完全可能的。今人也有把这一部分单独摘录出来，专门加以探究的了。

《天下》篇产生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，不是偶然的。当时孟子的“辟杨墨”，所谓“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人，不归于杨，即归于墨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；荀子的《非十二子》、《解蔽》诸篇；以及尸佼所论“墨子贵兼，孔子贵公，皇子贵衷，田子贵均，列子贵虚，料子贵别囿”（见《尔雅·释诂疏》引《尸子·广泽篇》）；韩非所述“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；《吕氏春秋》所举“老耽贵柔，孔子贵仁，墨翟贵廉，关尹贵清，子列子贵虚，陈骈贵齐，阳朱贵己，孙臧贵势，王廖贵先，倪良贵后”（见《不二》），都展现了一时群言淆乱，是非蜂起的局面。其间，正如马叙伦先生所指出的，除庄子而外，“很难找出另外一个人有这样精通一个时代的学术，更有这样的大手笔”，能够写出象《天下》篇这样的文章。尤其难能可贵的，是他能够站在一整个时代的高处，在与并世各派相争鸣当中，所表现的那种独有的风格和态度。他不象孟轲那样独断专横，反对杨墨，就说：“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，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简直要一棍子打死。荀子认为：百家之学，皆有所蔽，而“皆道之一隅”（《解蔽》）。态度就要好一些。但他又说：“天下有二，非察是，是察非，谓合王制与不合王制也。天下有不以是为隆正（标准）也，然而犹有能分是非、治曲直者耶？”（同上）只有“王制”才是判别是非的唯一标准，离开这个标准，就无从“分是非、治曲直”。于是，他主张

“学者以圣王为师，以圣王之制为法，法其法以求其统类，以务象效其人”（同上）。这依然是独断主义。其结果，便导致了其后学的“燔诗书而明法令”，规定“学者以吏为师”。达到了封建文化专制的最高峰。

庄子则不然，他认为“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，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；犹百家众技也，皆有所长，时有所用”。对于“墨翟、禽滑厘”、“宋钐、尹文”、“彭蒙、田骈、慎到”三派，作了具体分析，既有肯定，又有批判；对于“关尹、老聃”和自己的一派，虽然只是称述，无所批判，而他能把自已这一派也摆在百家之学当中，并不置之于百家之上，以为得道术之全；对于“惠施、桓团、公孙龙”一派，主要是批判了；但还说：“惜乎惠施之才，骀宕而不碍（原作得，据王闿运说改，辩才无碍之意），逐万物而不反，是穷响以声，形与影竞走也，悲夫！”对之寄予深切的惋叹之情。他与惠施为终身论敌，却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情，这些，都表现了他在争鸣中的宽广胸怀和全局观点，显示了一个旷世哲人的风度。

有人认为，庄子之学，到了魏晋时代才骤然风行，在两汉却未引起学者的注意。这种看法，早已有人举出若干事实，有所驳正了。从《天下》篇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对汉人的影响。淮南王刘安，大概就是两汉最早传庄子之学的。他有《庄子略要》一书，已佚，见《文选》注引。据清人俞正燮《癸巳存稿》卷十二考证，即《经典释文叙录》“司马彪注二十卷，五十二篇”条下所列“《解说》三”，以为《庄子》即刘安所传。

在刘安所著的《淮南子·要略》中，历叙诸子之学所由产生，其精神也是认为它们“各有所长，时有所用”。稍后，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指》，一开头就说：

《易》曰：“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涂。”夫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务为治者也，直所从言之异路，有省不省耳！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

与庄子《天下》篇的“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”云云，何其相似。对于“六家”，除道家以外，司马谈皆既言其弊，又言其“不可失”、“不可易”、“不可废”、“不可改”、“不可不察”，也与庄子对待各家所采取的态度相同。下至刘向、歆父子，我们从《汉书艺文志》中，也可看到他们所说的：

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。皆起于王道既微，诸侯力政，时君世主，好恶殊方，是以九家之学，蜂起并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驰说，取合诸侯，其言虽殊，譬犹水火，相灭亦相生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涂。”今异家者各推所长，穷知究虑，以明其指，虽有蔽短，合其要归，亦六经之支与流裔。（《诸子略》）

这是以各家合于儒，与《六家要指》之以各家会归于道家，有所不同。而其对待不同学派，都能保持一种全局观点和客观态度，是比较符合于辩证精神的。其渊源所自，盖出于《庄子·天下》篇。在今天，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些方面着眼，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，特别是以庄子在百家争鸣中所表现的那种全局观点和客观态度，作为借鉴，发扬先哲的优良传统，认真按照党的二百万方针办事，那末，对于活跃当前的学术、文艺空气，肯定是有好处的。